



## 丙午春，高邮城之殇

□ 陈友兴

《明史》：“太祖既平武昌，师还，即命徐达等规取淮东。”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），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汉政权后，即将目标指向了张士诚东吴政权。

是时，张士诚的势力扩张达到了顶点。《明史》：“土诚所据，南至绍兴，北有通、泰、高邮、淮安、濠、泗，又北至于济宁。”朱元璋的平吴战略，“先取通、泰诸郡县，翦其羽翼，后转取浙西”，即先夺取张士诚江北之地，再取江南诸地，最后攻其老巢平江。

闰十月二十六日，徐达、常遇春攻克沿江重镇泰州，隔断了张士诚循江北援的通道。十一月辛卯（初八），徐达转兵进围高邮城。

高邮地扼江淮水陆交通要冲，城外湖河相接，城内人物繁胜，人称江北泽国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朱元璋说：“张士诚由高邮啸聚，以有吴越，高邮盖其巢穴也。”至正十三年，张士诚义军占据高邮，并在此击败百万元军的围攻，乃张氏的发迹之地。张士诚后来移治平江，但高邮城一直在其经营掌控之下。

《弇山堂别集·诏令考二》，令旨：“教总兵官徐相国，你委付冯同知牢固封闭高邮城，采取的是关门打狗的策略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十九：“先是，达援宜兴，令冯国胜统兵围高邮。张士诚将余同金诈遣人求降，约推女墙为应，国胜信之，夜遣康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，皆为所杀。上闻之怒，责国胜。既而达自宜兴还，益督兵攻之，至是，遂拔其城，戮余同金等，俘其官将一千三十七人，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，马三百七十三匹，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户，粮八千石。上命以所俘将士悉遣戍沔阳、辰州，仍给衣粮，有妻子者赐夏布八匹，无者半之。”

《国初事迹》：“太祖命冯国胜围高邮。伪金院俞某开门诈降，国胜轻信，辄令指挥康泰等数百人先入城，俞某于城楼上忽放下闸板，关其门，尽杀之。太祖知不利，即召国胜回，决以大杖十，罚其步走高邮。国胜怒，四门齐上，一鼓而破之，俞某就擒。”此处段落，较《实录》更为详尽。

高邮守将，《实录》称余同金，《事迹》称其金院俞某。同金是官职，元置，正四品。《国朝典故》卷一：“丙午春，取高邮，执守将俞忠。”高邮守将余同金，本名当是俞忠，同金是其官职。

“入城”，“城楼上忽放下闸板”，所言地点乃是城门与瓮城，而以高邮北城门的的可能性为大。高邮北城门曰制胜门，城楼曰屏淮楼。宋金对峙之时，韩世忠、岳飞、张浚等南宋将领，曾在此屡破金兵，故有名。元末陈基《高邮》诗云：“秦邮水为国，层城高郁郁。三面阻重湖，深湍中荡滴。”高邮城三面阻水，惟北门外地势开阔，宋元

时期曾建有土城，便于屯兵，历来为高邮城攻防之所。北城门瓮城有三重，在四个城门中形制最为广阔，足可容纳相当数量的兵士，亦符合《实录》与《事迹》的记载。

《实录》，“是月（十一月），张士诚兵寇宜兴。上遣使敕徐达，令冯国胜围高邮。”张士诚军进攻江南宜兴，徐达领军增援，高邮战事交由冯国胜指挥。开战之初，朱元璋令旨徐达，“宜还师泰州，兼总冯国胜所部，留兵万五千人，以取未下州郡”。冯国胜围攻高邮城的兵力，实为一万五千人。高邮守军诈降，冯国胜轻信中计，致康泰以下千余将士被杀。朱元璋闻知大怒，就阵中召回冯国胜，重责十大军棍，罚其步行到高邮。冯国胜受罚后惭愧交加，回到前线倾全力攻城。

三月庚寅（初八），朱元璋谕示徐达，“闻寇兵在高邮者不满五千，……汝于扬州、泰州二军分取二万，直捣高邮。”令旨更具体：“水陆军扬州取四千五百，直捣高邮南门、西门；泰州军前将起一万五千人，共辎两万人。”丙申（十四日），“徐达拔高邮”。冯国胜率军长围高邮，所部兵力为守军的三倍，但其本部人马并未打下高邮，直到徐达增援两万生力军后，才将城池拿下。

从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徐达军攻城，至翌年三月十四日城破，历时126天，高邮城易手。

高邮城破后，徐、冯二人不论是出于报复还是泄愤，总之是大开了杀戒。

朱元璋为此整肃军纪，“亲笔谨封”，斥责徐达，“（张士诚军队）男子之妻多在高邮被擄，总兵官为甚不肯给亲完聚发来？这个比杀人那个重！当城破之日，将头目、军人一概杀了，倒无可论。擄了妻子，发将精汉来我这里，陪了衣粮，又费关防，养不住。杀了男儿，擄了妻小，敌人知道，岂不抗拒！星夜教冯副使去军前，但有指挥、千户、百户及总兵官的伴当，擄了妇女的，割将首级来。总兵官的罪过，回来时与他说话。”

这则令旨，揭示了这一段残酷的历史真相。

“杀了男儿”“这个比杀人那个重”。还是在三月，徐达乘高邮之胜率部转攻淮安，令旨：“说与总兵官徐达，攻破高邮之时，城中杀死小军数多，头目不曾杀一名。”朱元璋的三段话，坐证高邮城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杀俘事件。

高邮城中究竟屠杀了多少张士诚军俘虏，史无明载。三月八日，朱元璋说高邮守军五千人，当月十四日破城，自高邮献俘官兵至应天府者2212人。总人数减损近三千人，除去战死的，便是被屠杀了的。冯国胜军中诈降计被杀一千人，即使按照一比一对等的原则，杀戮守城军将士，起码不

会少于这个数字。

在元末战争中，无论是元廷政府军，各式地主武装，还是诸路义军，杀降杀俘是一种普遍现象。朱元璋军做得相对好一些，但也只是出于利害得失的考量，远没有上升到道德与政策的高度。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，令旨，“知会十一月初四日，捷音至京城。知军中获寇军及首目人等陆万余众。然而俘获甚众，难为囚禁。今差人前去，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。若系不堪任用之徒，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，不必解来。”还是对付张士诚，一次杀俘就在四万人以上。朱元璋的令旨，虽是浅显的元代白话，现在读来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森森杀气。

高邮杀俘，谁担主责？世人皆谓冯国胜，其实不然。

冯氏中守敌诈降之计，受到朱元璋责罚，有报复的理由。惩其首恶，但杀俞忠等主谋者即可，不必殃及余众。淮东前线总兵官是徐达，冯国胜只是副使，最后的决定权不在其手。徐达增兵二万后，才勉力拿下高邮城。前线最高指挥官就是徐达，直接下达命令的理应是徐达，冯国胜充其量只是协从。擄人妻子，处分“总兵官的伴当”，就连身边的亲随人员，也参与了此次大规模违反军纪的罪行，徐达实在是难辞其咎。朱元璋令旨付于徐达，却令其“星夜教冯副使去军前”执行军法，徐达应该就是推动杀俘的当事人。令旨“总兵官的罪过，回来时与他说话”，明确了徐达的责任，在语气上就是恶狠狠的警告了。

至于朱元璋本人的态度，就很值得玩味了。朱元璋是招降纳叛的高手，在俘虏中去老弱留精壮，是其发展壮大军队的一贯手法。朱元璋责骂徐达，“擄了妻子，发将精汉来我这里，陪了衣粮，又费关防，养不住。”意思是你们在高邮屠杀降军，抢了降军的妻小，却把留下不杀的精汉送到我这里来。这帮人的老婆孩子都给你抢了，就算赔上老本也收不了这些人的心，根本不能用他们打仗，只能“遣戍沔阳、辰州”了事。“当城破之日，将头目、军人一概杀了，倒无可论。”朱元璋恼怒的不是屠杀，而是屠杀的不够干净彻底。

朱元璋深咎徐达、冯国胜活儿不密，“杀了男儿，擄了妻小，敌人知道，岂不抗拒！”杀俘虏，抢妻女，损害了朱家军王者之师的形象。敌人知道了，也一定会顽抗到底，以后的仗就不好打了。

高邮之役后，徐达恩荣迭被，为总兵官，为大将军，为征虏大将军，为右丞相，官位一路飙升。朱元璋的整顿军纪，高举轻放，更像是一种姿态。

在江山与权力面前，人命微若蚁蝼。“吾为天下计，岂惜小民哉！”汉末董卓如此，一千多年后朱元璋与徐达们亦如此。

张士诚政权深耕高邮十三载，兵民浑融。数千殒命者，为夫，为父，为子弟！群雄争霸，主残将虐，即使在数百年之后犹令人愤叹。

至正二十六年，丙午之春，高邮城至暗的黑色三月。

路灯给夜行带来方便，但也会给草木生长带来影响。在乡下时，单位附近有一家企业，工人经常要上夜班。为了工人夜间安全，企业给一条道路安装了路灯。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但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。路灯开放后，路两旁的水稻迟迟不能成熟，因错过了季节而减产。附近农民便将企业告上法庭。原来水稻也属于短日照植物，而彻夜长明的路灯，延长了光照时间，使水稻对短日照的要求无法满足，从而影响了其开花和成熟，造成减产。最终农民打赢了官司。

此类案例时有发生。所以现在有规定，路灯不得通宵照明，要适时关闭。尤其是路两旁有农作物的，更不能彻夜开放。这不光是节约能源的问题，更是为农作物生长着想。草木跟人一样，夜晚也需要歇息。

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劝人恨要有度，要适时化解昔日的恩怨情仇，不要长久地郁结心中，没完没了地恨，乃至走火入魔，生出祸端，害了别人，也误了自己。有人就此认为爱可以不受节制，可以纵情去爱，让世界充满爱，甚至溺爱，其实也是不可取的。

爱同样要有度。

## 说书

□ 徐松

说书，是传统的曲艺形式之一。我们扬州一带，则是以扬州方言来说书，人称“扬州评话”。明代张岱《柳敬亭说书》中记载：“南京柳麻子，鬻黑，满面疤痕，悠悠忽忽，土木形骸，善说书。”由此可见，其历史悠久。

比起其他艺术，说书要求不高，只需一张桌子和椅子（凳子）就行，就像林嗣环《口技》里写的“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抚尺而已”。这场景，我很熟悉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电视还没有普及，除了偶尔看电影或看戏外，岁数大点的，还会去“听书”，我常有会随大人们去玩。

书场设在文化站内，有两间教室大小。中间是过道，两旁摆着木条椅。前面有个小舞台，上方挂着汽油灯，台口也被观众们占领了。最显眼的，是两位长者：右边胖胖的那位，是我的舅老太爷；左边眉毛白而长的，是费老太爷。

上场的是王丽堂先生，她穿着旗袍，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两眼放光，扫视全场。随着醒木落下，原本吵吵闹闹的礼堂，顿时鸦雀无声。

“今天我要说的书，是《水浒》中的一位英雄——武松的故事。武松是哪里人士？他是北直广平府清河县人……”由于说得投入，加上汽油灯烘烤，王丽堂先生时不时地拿起桌上的手帕擦汗。正听得入迷时，就听到“啪”的一声，“欲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”当晚的演出就结束了，台下的观众，个个意犹未尽……“说书”是假，交代是真，前有悬念，后有照应，描述细腻，细节传神，这大概就是观众们痴迷的原因吧。

高邮王氏父子纪念馆内，也设过书场。扬州评话非遗传承人惠兆龙先生，在此说过《陈毅过江》。他把语言与手、眼、身、步等形体动作结合起来，佐以丰富的面部表情，塑造了儒雅自信、豪爽豁达的伟人形象，观众们多次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。

一度时期，电台播放过王少堂的《水浒》、刘兰芳的《岳飞传》、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等录音。夏日午后，有收音机的人家，门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，大家都竖着耳朵听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。这当中，就有我的身影——我也是个小书迷，而且还有段“说书”的经历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学校挑选我和一名女生，去当“故事员”。接到任务后，我采用“化整为零”战术背讲稿，四五页长的文稿，带个晚竟然全记住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师让我背给他听。然后，他说：“你爸爸是才子，演过胡司令，让他帮你多加工，最好穿插点动作，过几天要过堂呢。”

回到家，我转述了老师的话。爸爸说：“讲故事，要绘声绘色，声音要有快慢高低，说的内容和动作要协调，幅度大一点，但不能喧宾夺主。”他还说：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你没看到人家杂技团的孩子，一大早就在那儿练功？”那几天，他常给我做示范，让我对着镜子找感觉。

过了两三天，去文化站“过堂”。那儿，除了站长，还有几个生面孔。他们让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，还为我物色了一位姓下的师傅。师傅平时喜欢开玩笑，可一到排练时，就十分严肃：“上台站稳，平视全场，目中无人，但心中要有人。”

师傅说的是《西门豹治邺》，每当他登台，我就守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他说：“那个巫婆，脸像花生壳子形，搽了许多粉，淌汗后活像一块上了霉的咸肉皮；说起话来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中间只差个断气……”引得台下哄堂大笑，可他正襟危坐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在他严格要求和示范指导下，我又有了长进。

不久，通知去公社小礼堂汇报演出。那晚，化了淡妆，套上白衬衫，身着蓝裤子，穿上白球鞋。灯亮了，该我上场了。我学师傅的样子，醒木一拍：“话说，春秋时期……”台下响起了欢笑声和掌声，好长时间才静下来。

一星期左右，来通知说参加“一城三镇”巡回演出。第一站先去临泽，吃住都在临泽中学，说书地点在文化站。演出间隙，安排专人教唱京剧唱段。有天晚上，在李部大队场头放露天电影。开映前，还特意安排我们说了一会书……

这么多年来，我对说书的兴趣丝毫不减，而随着时代进步，说书的方式却在悄然变化。

两年前，在陕西榆林某个广场，见到一位说书的，手中弹着三弦，脚上带着响板，嘴上一会儿说一会儿唱，很是新鲜。

前段时间，无意中刷到“小马抖趣”，内容是扬州评话“武松打虎”。传统的曲艺形式，借助抖音平台传播，吸引了不少的粉丝，赢得了较旺的人气。

看来，艺术生命与人的生命一样，都是一个过程，唯有不断创新，才能得以传承。就像说书一样，不管什么时代都需要，关键在于说什么，谁来说，怎么说。

生命需要光。没有光，草木不能长，人类和其他动物就没有食物来源，也不能活。万物生长靠太阳。万物不仅仅指草木，涵盖所有生命。但如果认为光照越多越好，通宵达旦地给作物照光，也是大错特错。

菊花为什么要等到深秋才开？许多人会问这个问题。孩子们会问，大人们也会问，诗人们更会问。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，一样花开为底迟。”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，也在问同样的问题。其实，许多人不知道，菊花迟开的原因，正是光照太多的缘故。

菊花是短日照植物，在自然条件下，每年11月份开花。所谓短日照，即每天照光的时间要短于黑暗时间，不能超过12小时，否则不能开花。春分和秋分是一年中昼夜平分的日子，每年的春分大约在3月20日前后，秋分在9月23日左右。春分过后，白天长于夜晚，秋分过后，则是白天短于夜晚。如此看来，秋分之前，菊花是断然不会开放的。而秋分之后，则夜长昼短，开始满足短日照条件。但菊花也不能马上就开，还要经过大约一个半月的孕育，至11月中下旬，才会绽放。此时已秋风渐起，百花开尽，菊花只能孤独地开了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

## 爱有度

□ 张玉明

许多人可能将信将疑，但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园艺师可以通过控制光照时间，人为地控制菊花的花期，让它提前或推迟开放，甚至可以做到，想它什么时候开，就可什么时候开。譬如，想让菊花提前到10月1日国庆节开，则可提前45天开始做准备，大概从7月15日开始，每日上午8点，将盆栽的菊花搬到太阳下照光，下午5点搬回屋内，拉上不透光的窗帘，锁上房门。如此反复，坚持45天，就会如期开花。要注意的是，中途不能有中断。假如某天事忙，忘记搬回，超过12小时光照，则前功尽弃，需从头再来。至于将房门锁上，主要是怕有人误入房间开灯，也会使努力付之东流。如果想让菊花推迟到春节开放，则秋分过后，每天下午天黑后，再开灯补充3至4小时，一直到距春节还有45天时停止补光即可。

短日照植物除了菊花外，一些秋熟的作物也是。比如水稻、大豆、扁豆等。